

##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和增订考论

周逢琴

(西南科技大学 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摘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一部用文言撰述的“现代”文学史,其写作起意于1917年,起手于1922年。这两个时间节点恰好分别对应着当时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及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发表,呈现出钱基博这本文学史同新文化、新文学的抗辩和对话关系。然而,《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立场并非简单的崇文言而反白话,它对近代文化有着全面的批判和反思,在四版增订中,这种批判倾向体现得尤为明显。

**关键词:**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增订;考论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126(2021)01-0021-07

钱基博,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家、文史专家、教育家,一生专注于学术的探索,具有深厚的国学造诣。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独步文学史林,无论是在热销的20世纪30年代,还是在再掀出版热潮的20世纪90年代,都引发了一波热议。《现代中国文学史》最早于1932年12月由无锡国专学生会集资排印,初版约32万字,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sup>①</sup>,两年之内,连续再版,1934年第二版印有“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再版”,1935年第三版印有“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初版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三版”,1936年9月又出版增订本,并增“四版增订识语”,增订版约42万字<sup>②</sup>。审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和增订,笔者发现: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及胡适的文学史叙述形成某种抗辩和对话关系;从初版到四版增订,历时四年,增订约十万字,这种抗辩的声音并未减弱,且增订版既回应了新文学阵营的批评,亦有与旧学同仁商兑之意味。长期以来,学界在论及《现代中国文学史》时,往往不注意区分其版本,对该著作的文化立场以“保守主义”笼统言之,忽略了他与新、旧学阵营的双向对话。笔者试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和增订作一梳考并加以浅论。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时间,据钱基博说:“余搜讨旧献,旁罗新闻,草创此编,始民国六年,积十余岁,起王闿运以迄胡适,哀然成巨帙。”<sup>[1]</sup>民国六年即1917年,正是新文化运

<sup>①</sup>1935年第三版标记“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初版”,疑为阴历八月。

<sup>②</sup>1974年收入中国台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刊。1986年5月湖南岳麓书社据第四版印行,此后《现代中国文学史》有多个版本,或依初版,或依四版,但是并没有特别标明版次,这是出版商的疏忽。

[收稿日期]2020-12-06

[作者简介]周逢琴(1973—),女,安徽无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

动初起的时候。那么《现代中国文学史》是1917年就开始编撰的吗？钱基博时年31岁，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当时这所学校摹仿日本东京师范学院，虽是中学体制，实为大学规模。钱基博提倡古文辞，教材用的也是自编讲义<sup>[2]</sup>。这一时期钱基博编写的教材讲义，计有“国文类”八部、“读经类”四部、“杂学类”二部<sup>①</sup>。这些教材并未涉及当时的文坛和《现代中国文学史》所列的写作对象。因此，由于当时教学繁忙，钱基博未能真正着手文学史的撰写。但新文学的异军突起及其引发的新、旧对立和争论，引发了他的思考，激起了他与之对话的欲望。写作并未进行，他却特别注明始自“民国六年”，显然是对“现代”文学“有话说”的意思。

钱基博着手写作《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在1922年。1926年为撰写文学史搜集资料，钱基博曾向章士钊索要1925年全年的《甲寅》杂志，他在信中说：“仆于民国十一年，草《现代中国文学史》。”<sup>②</sup>王玉德在《钱基博学术年谱简编》里也提到“初稿撰于1922年”<sup>[3]</sup>。这个时间，比傅宏星《钱基博年谱》中认定的写作时间要早一两年，《钱基博年谱》据1950年代钱基博的《自我检讨书》中“我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在圣约翰起手”<sup>[2]271</sup>，认为他1923年开始撰写文学史。笔者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时间当以1926年发表的信件为准。《钱基博年谱》提到，1923年秋季开学，钱基博辞去省三师教务主任一职，出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系教授，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期间，他先后主讲“国学概要”“现代中国文学史”“模范文”等课程<sup>[2]64</sup>。其实，早在成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教师之前，钱基博已经胸有成竹。从《自我检讨书》中，我们看到，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课堂上，钱基博与学生慷慨而谈：“我想讲近三十年文学演变以到胡适，其人皆现在；而姓名，皆诸位在报上看到，必能发生兴趣。然而旧演变，形形色色；中国四千年文学之演变，亦可缩影到此二三十人身上，作一反映。”<sup>[2]270-271</sup>可以推断，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期，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讲义已经基本成形。

1922年，胡适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可以假设，钱基博1917年想要动笔的文学史，在1922年胡适文学史的刺激下，正式启动了。事实上，钱基博并不反对白话文运动，但他又确实反对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的“过激”言论。1919年前后，在《致费范九书》中，钱基博就对时风表示不满：“或激而出于卤莽灭裂之破坏，或流于厌世而为不事事之消极。”<sup>[2]58</sup>在他看来，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是“卤莽灭裂”地醉心西化，一些古文学家则是“不事事”地一味守旧。《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正是出于救弊的心理，弊有二，一曰执古，一曰鹜外。钱基博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中西融通”，他既坚持传统之道，又希望藉西方文学激活我们自身的传统，这和“学衡派”“甲寅派”对待白话新文学的态度看似一致，但却有着微妙的差别。事实上，他并非简单地崇文言而反白话，而是力求站在较为折中的位置，重审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所讨论的诸多文学问题。

《现代中国文学史》明显具有与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抗辩的色彩。很多人对钱基博之“起王闿运以迄胡适”的文学史分期表示不解，也对他的“现代”（详于民国以来而略推迹往古）颇有异议。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说：“该书所谓现代，始于1911

①“国文类”八部：《文字源流》（油印本，下落不明）、《语体文范》、《高等小学国文教材》（油印本，此书是为即将毕业的本科四年级学生作示范所用）、《国文》（新师范讲习用书）、《斯文统宗》（下落不明）、《国文研究法》（油印本，又名《戊午暑期国文讲义汇刊》，已刊）、《国学必读》（新中学教科书）、《读书稽古法》。“读经类”四部：《孟子约纂》、《孟子解题及其读法》（油印本）、《春秋约纂》、《礼记约纂》（铅印本，下落不明）等。“杂学类”二部：《佛经讲义》、《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油印本）等。

②钱基博《钱基博致章士钊函》，《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六号“通讯”栏，1926年12月18日。

年,即以辛亥革命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所叙为1911年至1930年之中国文学,范围略近于陈子展的《三十年》(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引者注),却是立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sup>[4]</sup>这里,三十年或五十年,都能说得通。以王闿运论,王闿运生于1833年,比鲁迅、胡适早五十年以上,若说钱基博关注的也是“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似乎也不为过。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论列的桐城派、江西诗派、新民体、逻辑文以及王闿运、章炳麟、林纾等,也都是《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点论述对象。钱基博说:“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应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引者注)不为文学史。何也?盖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夫纪实者,史之所为贵;而成见者,史之所大忌也。”<sup>[5]</sup><sup>4-5</sup>可以说,正是对胡适贬抑五十年来中国旧文学的偏激姿态不满,才有《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诞生。

## 二

《现代中国文学史》在1933年出版后,新文学作者,即所谓“胡适之徒”,对于该书多有责难。综观新文学作者的批评意见:一是质疑《现代中国文学史》对胡适、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的偏见;二是攻击所谓“文苑传”的文学史体例。“关于白话文派的叙述,只费二十四页,而引《尝试集》自序之文,竟占一十四页,这样地不明时代之所胜,当然是没有资格写文学史的。”<sup>[6]</sup>“顷见钱基博氏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至三十万言,其论白话文学,不过万余字,仅以胡适入选,而以鲁迅、徐志摩附焉。于此诸人,大肆誉警。”<sup>[7]</sup>“多叙琐事末节,大部分与文学的本身,没有关联。而其性质,便与旧式的‘文谈’‘诗话’绝无差别。这乃是以‘文苑传’的方法来写文学史,而不是以文学史的方法来写文学史。”<sup>[6]</sup>“文学史家,应当从风尚流派运动和趋势中去考量时事的演变,以及作家的和作品的地位与状态。而本书的著者呢,他却是以一个大师也者,去代表那一派了。”<sup>[8]</sup>

《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否沿袭了“文苑传”的写法,“文苑传”的体例是否适用于现代?钱基博在撰史之前似乎就预见了一种争议。他在绪论里,对“文学”“文学史”及“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义界作了一番辨析,言明了自己治文学史的路径和特点。钱基博理解的“文学”乃大文学观念中的“文学”,他特别重视“文学作业”(指文学著作或作品,引者注),认为文学史重点在于记载“文学作业”。他认为,古代“文苑传”记载了以文学显于世的文人,但更多的大家却不囿于文苑,入“文苑传”的不过是第二流以下的文学家。“文苑传”既然并不能反映文学发展的真正历史,理当抛弃,但是,“文苑传”考证文学家履历,又有其科学合理的意义。钱基博还为“文苑传”体例找到了“新”依据:“欧西批评文学家尝言:‘人物、环境、时代三者构成艺术之三要素也;欲研究一种著作,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环境及时代。’质而言之:即不可不先考证文学家之履历也。然而所以考证文学家之履历者,其主旨在说明文学著作。”<sup>[5]</sup><sup>6</sup>将“人种(种族)”偷换为“人物”,使之切合中国文学史叙述的方式,成为治史的新理论基础,可谓煞费苦心。

钱基博继承了“文苑传”的传记法,却扬弃了“文苑传”只记文学家的狭隘眼光,而将关乎时代风云的重要作者纳入文学史视野,并大量援引他们的“文学作业”来体现时代风貌和文学的发展变迁。《现代中国文学史》大量甚至全篇引用著作原文,在增订版中也不改此例。这既有保存史料的作用,有时候也能形成磅礴的文气。如他论章太炎“放言高论而不喜与人为同”,抛出了六大论据:“时论多诋秦专制;而炳麟不然”,“时论方崇汉党锢;而炳麟不然”,“时论咸薄宋程朱;而炳麟不然”,“时论方蔑道德,奖革命;而炳麟不然”,“时论方

慕共和,称代议;而炳麟不然”,“时论方兴学校,废科举;而炳麟不然”,并在每条论据下引章氏大段文字详述其独异之见,这既显示了当时宏阔的社会思潮背景,更突显了章太炎的学识和人品,彰显了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独特的写作个性和魅力。

《现代中国文学史》又名《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据“瀚文民国书库”数据库,无锡国专学生会版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长编”提示的是该著作偏于史料的汇集,如胡先骕所说的“长编云者,实乃未成之书,则所收资料将益多……”<sup>[9]</sup>。钱基博自述著述时亦说是“长编”:“……曰《后东塾读书记》,曰《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sup>[10]</sup>正式出版的时候,除了序跋中提到“长编”,四个版本都不再加“长编”二字,便有读者讥笑:“这叫做‘鱼目混珠’。”<sup>[6]</sup>也有人批评道:“史料的书多是本‘有闻必录’宗旨,其目的是搜辑材料,供给旁人参考之用”,而且指出钱基博在择取材料的时候不够客观,“这本书偏见太多,有的地方作史料读,也不太合适呢”<sup>[8]</sup>。可以推想,钱基博在文学史完稿之后,也曾徘徊于是否命名为“长编”,是否自谦为“未成之书”,而他最终舍弃了“长编”二字,显示了他对自己创制的文学史体例和文学史观深有自信。

事实上,批评者最不满的就是钱基博对于白话文学的“偏见”。《现代中国文学史》对白话文学“只费二十四页”,似乎太不重视白话文学,对胡适、鲁迅的记述,在篇幅上大大少于其他的古诗文作者。当然,“偏见”主要来自钱基博所持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但“偏见”有时候也来自客观,仔细衡量,原来适合钱基博文学史体例的“当代”资料极为难得。由于现代文学期刊杂志繁多,新文学作品搜集的确不是一件难事,但新文学作者的传记却很少见,符合“文学作业”的传记资料相当不完备。举例来说,《现代中国文学史》增订版增加了胡适的文学履历,而初版不传,并不因胡适是白话文学作家,而是因为彼时没有胡适的传记材料。胡适的《四十自述》,从1930年6月动笔,30年代初写成,发表在《新月》杂志,1933年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合辑出版单行本。《现代中国文学史》增订版适时用文言改述了这篇《四十自述》,而其他作家如周树人、周作人、徐志摩,至1936年增订出版时,仍很难收集到类似的详实材料。

### 三

钱基博于1936年5月20日开始增订,至7月11日完成,历时一月又二十二日,《现代中国文学史》终于增订完毕。旧学同仁的奖勛是增订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钱基博又保留了自己的增订标准。《四版增订识语》提到:“自柳诒徵、胡先骕、郑桐荪、陈瀛一、刘麟生、陈焱涛、潘式、王利器、郭斌佳诸君,或识或不识,莫不致书通殷勤,匡我不逮。而胡先骕、郭斌佳两君,更有批评介绍之文,见于报章,绵绵千百言,奖勛交至。刘麟生君则全书校读,拾遗补阙,以校勘记见遗。”<sup>[11]</sup><sup>450</sup>在这些批评者中,胡先骕的意见最引人注目,胡先骕撰写长文《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肯定其为“有个性之作”,章炳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士钊、胡适“诸篇皆极精粹”。但他指出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不够完备,有一批诗文大家都遗漏了。“现代治散文者,必不能不举陈三立,而郭立山之为桐城派名宿,岂可一字不齿及?会稽之马一浮,亦巍然大家而钱书未言及者也。至于诗则所失益多矣……述王闳运而不及高心夔,述中晚唐诗而不及梁鼎芬,述康有为而不及邱逢甲、黄遵宪,述陈三立而不及俞明震、陈曾寿,述闽诗而不及陈书、沈瑜庆、张元奇,举胡朝梁而不知江西诗人华焯、胡思敬、杨增萃及后起之汪国垣、王易、王浩,述梁启超而不及林旭、刘光第,张朱祖谋、况周颐而不及文廷式、郑文焯、赵熙、周岸登、王易,宁非异事?”<sup>[9]</sup>其他不该遗漏的,还

有同光体魁杰沈曾植(沈曾植是胡先骕的老师),处于不论不议之列的还有柯劭忞、周祖模、曾广钧、曾习经、张謇、郑沅、王树枏、程子大、冒广生、黄节、范罕、柳诒徵等。

《现代中国文学史》增订版增列了二十余位诗文家,《四版增订识语》列举如下:

旧无其人而今增入者:如魏晋文王闳运之增附廖平、吴虞;骈文孙德谦后之增黄孝纾;散文马其昶之增附叶玉麟,又增王树枏、贺涛附张宗瑛、李刚己、赵衡、吴闳生;诗中晚唐樊增祥、易顺鼎之增附三多、李希圣、曹元忠。又增杨圻附汪荣宝、杨无恙;同光体之增附奚侗、何振岱、龚乾义、曾克崑,又增异军突起之金天羽;以及词朱祖谋之增附龙沐勋,曲吴梅之增附卢前。<sup>[11]450</sup>

有意思的是,增订的“意见”受到了重视,但几乎没有增入胡先骕所提到的各家。显然,钱基博内心自有标准,在笔者看来,他重视的乃是有影响力的“作者”,而非单纯的“文学家”。胡先骕在《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还对苏曼殊的文学成就提出质疑,胡先骕说:“吾最不解者,厥为其张苏玄瑛。苏氏浪漫和尚耳,何足以云乎志洁行芳?仪刑浇世,而轶乎章炳麟?且闻其著作多为他人润色而成者,则其集且为贗品,以视诗僧寄禅,大有上下床之别。作者无亦狃于文人结习,以南社人张之而亦张之耶!”<sup>[9]</sup>在增订版中,我们看到,叙诗僧寄禅的文字一仍其旧,而对苏曼殊也未删一字,推测起来,应是格外看重苏曼殊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同理,他也特别肯定林纾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的贡献,认为他为中国文学“别辟蹊径”:“然纾初年能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时;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蹊径。”<sup>[11]176</sup>当代有学者说:“将《现代中国文学史》置于中西文化相互制衡的时代背景中解读,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钱基博挽颓淑世的知识分子情怀、了解新文学家批驳本书的有失公允之处。”<sup>[12]</sup>诚哉斯言。

增订版增入了新文化运动中“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讨论了吴虞的学术文章,提到:“其论学,疑六经,非孔子,非孝非礼;以为‘孔学之助张君主以行专制,借礼制法制而确立;其专制不平,直接关系于吾人之生命财产权利义务者极大。苟由礼制法制之精神,以推论其得失,而再以各立宪共和国之宪法民法刑法所规定者,一一比较对勘之;而后孔子之学说,二千年来贻祸于吾人者昭然若揭。’”<sup>[11]55</sup>对于吴虞非孔的言论,钱基博并未表示异议,但是对于吴虞反孔的激烈姿态,钱基博却不以为然:“虞为王闳运再传弟子……决弃一切,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如石转崖,不坠地不止。”<sup>[11]56</sup>时隔二十年,钱基博对新文化运动的回顾和批评态度更加鲜明。

新文化运动中特别激烈地要打倒的文坛偶像桐城派和江西诗派,钱基博也格外措意。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视吴汝纶为桐城-湘乡派最后一员大将,钱基博就增列了王树枏、贺涛、叶玉麟、张宗瑛、李刚己、赵衡、吴闳生等,以示桐城派后继有人。《现代中国文学史》初版于“散文”,只列“林纾 马其昶 姚永概 附兄永朴”,简单区分流派曰“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云”<sup>[5]137</sup>。增入王树枏等人后,列“王树枏 贺涛 马其昶 姚永概 永朴 林纾”,并理出了近代的桐城派一脉。“自曾国藩倡以汉赋气体为文,力追韩昌黎雄奇瑰伟之境,欲以矫桐城缓儒之失;……桐城吴汝纶、武昌张裕钊衍其绪……武强贺涛,北方之强,得法汝纶……其次新城王树枏,体势宏远,辞笔警练……”<sup>[11]125</sup>而以林纾殿后,认为林纾对于古文并无宗派之见,转而主张宗派,只是为盛名所累,“或者以桐城家目纾,斯亦皮相之谈矣”<sup>[11]174</sup>。

在“白话文”一章,钱基博删削了被读者批评“竟占一十四页”的《尝试集》自序之文,增入了胡适的诗歌作品。不过,钱基博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欣赏胡适的白话诗,而将反对者意

见大量揽入,如胡先骕的《评〈尝试集〉》、裘毓麟《论科学方法之不足以治国学》。增订版论及的新文学作家也增添了数位,包括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林语堂等,并对新文学社团和流派有进一步的论述,但对新文学实绩仍持贬抑态度。初版提到“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周树人、徐志摩则为文艺之右倾者”<sup>[5]</sup><sup>448</sup>,这曾被读者拈出来讥笑,但增订版仍坚持此说,表述稍有差异:“而周树人、徐志摩,则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望。”<sup>[11]</sup><sup>446</sup>对周作人、林语堂,则上溯到明末小品文,钱基博论曰:“语堂又本周作人《新文学源流》,取袁中郎‘性灵’之说,名曰‘言志派’。呜呼,斯文一脉,本无二致;无端妄谈,误尽苍生!十数年来,始之非圣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矣。”<sup>[11]</sup><sup>447</sup>在钱基博看来,新文学之所以有此“循环论”,皆是由于在文化上鹜逐声气,不知道尊重和坚持自己的传统——“惟不知有己,故至今无以自立”<sup>[11]</sup><sup>447</sup>。

#### 四

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局动荡,学说腾起,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尚在探寻中,《现代中国文学史》关注的也非狭义的文学。有一位读者评价《现代中国文学史》:“晚清以来,国内负名之文学巨子,不仅以文学谦于时,林纾之翻译欧美著作,康梁之变法维新,胡适之倡白话而抑礼教,均于文学创造之外,别有其事业与贡献,影响所及,或较其文学创造为伟大。本书于这些地方,也不轻易放过,故如于康梁之变法运动,作详尽之叙述;于述章士钊之逻辑文学,也夹叙其任教育总长时学潮之变之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本书不仅可作文学史读,并且兼可作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读。”<sup>[13]</sup>事实上,《现代中国文学史》亦可兼作现代文化思想史读。在《四版增订识语》中,钱基博指出,近代文化界,有自始为之而即致其长虑却顾者,章炳麟是也;有自始舍旧谋新,如恐不力,而晚乃致次骨之悔以明不可追者,陈三立、王国维、康有为、严复、章士钊是也;有唯恐落伍,兢兢焉日新又新以为追逐,而进退维谷,卒不掩心理之矛盾者,梁启超、胡适是也<sup>[11]</sup><sup>452</sup>。无论是古是今,是新是旧,在钱基博的文学史叙述中,始终暗含着文化的隐忧和文化批判的锋芒。

从写作和增订的情况来看,《现代中国文学史》并不只肯定文言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全盘否定新文学的尝试,在与新、旧学的抗辩与对话中,《现代中国文学史》树立了卓然自立的文化品格。这是一部带有文化批判性质的文学史,它既审视新,也反思旧。如果说他所坚持的是文化保守主义,那也是一种“批判型”的保守主义。“中西融通”是钱基博一贯的文学和学术立场,真正的国学不是封闭的、向后看的,在西风东渐的大背景下,新旧之间,钱基博采取了可谓“横站”的文化姿态,与新旧两方面刻意拉开距离。对于缺乏文化的长虑而鹜逐声气的文化现象,钱基博始终保持着极大的敏感和严厉的批判态度。《现代中国文学史》跋云:“读者以此一帙为现代文人之忏悔录(初版作‘孽镜台’)可也。”<sup>[11]</sup><sup>448</sup>作者为现代文人“忏悔”,其实质是文化的批判。这种文化的批判在初版写作时已见端倪,到四版增订时,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鲜明的思想薪向。

#### [参 考 文 献]

- [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跋[J].光华大学半月刊,1932(5):20.
- [2]傅宏星.钱基博年谱[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3]王玉德.钱基博儒学论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286
- [4]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0

- [5]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上海:世界书局,1935.
- [6]穆士达.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批评[J].图书评论,1934(10):31-33.
- [7]戚施.钱基博之鲁迅论[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28.
- [8]王旬.评钱基博之《现代中国文学史》[J].众志月刊,1934(1):52-59.
- [9]胡先骕.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J].青鹤,1934(4):26-28.
- [10]钱基博.钱基博自传[J].江苏研究,1935(8):1-4.
- [1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傅道彬,点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12]姜弘.综贯百家 洞流溯源:重读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J].书屋,2007(12):27-34.
- [13]陈豪楚.新书介绍:《现代中国文学史》[J].浙江青年(杭州),1935(4):166-169.

## Qian Jibo's Writing and Revision of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ZHOU Fengqin

(School of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Abstract:** Qian Jibo's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written in classical Chinese. It was conceived in 1917 and started in 1922. These two points respectively corresponded to the turbulent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and the publication of Hu Shi's *Chinese Literature in Recent Fifty Years*, which presents the defense and conversation between Qian and the writers of new culture and new literature. However,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neither simply advocating classical Chinese nor anti-vernacular Chinese. There is comprehensive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to modern culture, and this critical tendency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fourth edition.

**Key words:** Qian Jibo;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riting; revision; textual research

(责任编辑:师艳玲)

(上接第81页)

## “Crisis” and “Opportun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Micro-media”

WANG Xincheng

(Party School of Tangsha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micro-medi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facing “crisis” and “opportunity”. The “decentration”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bodies,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the excessive openness of knowledg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access channels, “micro-media”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owever, micro-media also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ome aspects, such as fields, carriers and ideas. In micro-era, to explore the way to turn the crisis into opportunities, we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micro-media” to occupy the “micro-positions”, create “microenvironment” to get involved in the “micro-life”, and use “microlanguage” to gather “micro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micro-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pportunity; challenge

(责任编辑:师艳玲)